

“流动的地方”： 滨水工业空间更新中的人地关系再造机制

凡婷婷 邵文喆

(北京师范大学 计算传播学研究中心, 广东 珠海 519087;
北京师范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滨水工业空间历经从城市“工业中心”“工业锈带”到消费前沿的转变,是研究人地关系动态演变的重要案例。基于城市存量更新背景,立足地方感理论的地方记忆与地方认同维度,采用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法,探讨滨水工业空间更新中的记忆与认同问题。研究围绕滨水工业空间更新模式中地方意义的流变,进一步指出这类空间的地方认同建构主要通过三重相互关联的机制来实现:物质符号的存续锚定了工业遗存的历史脉络、人地关系重组再造了更新后的新感觉结构、数字媒介的转译则为公众塑造虚实融合的新地方记忆,三者共同促进栖居者对滨水工业空间的新地方认同。研究揭示,当代城市更新中的地方感维系是在多重维度上持续性协商、转译与再创造的流动过程,与数字技术和动态交互网络关系密切,为动态取向的地方感研究拓展了视野。

【关键词】城市更新;城市传播;地方记忆;地方认同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406(2026)03-0086-12

DOI:10.19480/j.cnki.cmgc.2026.03.005

一、研究缘起

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存量大、质量好的工业遗产空间转型改造已成为全球性议题。引导工业园区提质增效与转型升级业已被我国国家发展改革委确立为明确的发展方向。^①在我国,许多城市中的老工业基地作为工业文明的遗存,不仅是单一的大生产遗址,更是特定历史时期集体生活方式与社会组织结构的集中体现,承载着工业化时代的集体记忆。在此背景下,如何在关注其物质实体更新的同时,激活这些空间所蕴含的地方意义与集体记忆,成为城市更新中一个亟待探讨的问题。

在众多工业遗产类型中,位于城市水陆交界处的滨水工业空间类型独特,其更新改造过程展现出跨学

【作者简介】凡婷婷,北京师范大学计算传播学研究中心、新闻传播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

邵文喆,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为暨南大学国际传播研究院2025年度招标项目“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传播符号系统建构与效能提升研究”(IIC-TS202502)的阶段性成果。

科的研究价值与理论张力。这类空间常以港口码头为原点，不仅历经从城市工业中心到工业“锈带”的剧烈变迁，如今也常被重塑为象征城市形象的文化消费空间。其演变历程体现了一座城市的地方意义的更迭，也因此成为研究地方记忆如何被选择、更新及商品化的重要时代案例。现有研究对工业遗产空间的关注，多集中于物质保存、功能活化与经济价值转化等视角。虽有研究明确指出，城市空间中的工业遗产作为后工业景观的重要组成，是表征人类在工业化时期改造和再造自然的时代产物，是时代记忆和城市文化记忆的关键载体。^②但是，对更新过程中地方记忆的延续、地方认同的流变等动态地方感生成机制的探讨却还不充分。

本文认为，工业遗产空间是一个复杂的城市文本生产与传播系统，其空间更新的规划方案、景观命名、导览解说及文化活动等都在重新构成一套新的符号与叙事装置，持续对公众产生此地“应如何被感知、记忆与认同”的人地关系建构过程。相比于段义孚基于地缘关系的积淀提出的“恋地情结”，^③对于如滨水工业空间这种处于激烈意义争夺中的“流动的地方”来说，还需以一种流动的地方感视角展开研究，关注其地方意义的流动与其中的人地关系，以及这一关系在经历何种协商与转译后被逐渐确立下来。因此，本研究试图通过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法捕捉滨水工业空间更新中的意义流动痕迹，关注不同更新模式如何重构地方意义，其中共同的更新策略又如何影响公众的认知、体验与认同？通过对这一空间更新与地方再生产过程的剖析，本研究旨在探讨特定地方意义如何经由传播实践被重新建构，揭示滨水工业空间更新中流动的地方感的维系机制。

二、文献综述

（一）滨水工业空间的研究脉络与学科跨越

作为城市这一有机生命的关键脉络，滨水是指与河流、湖泊、海洋毗邻的土地或建筑，是城镇临近的水体部分和城市中的特定空间地段，按毗邻水体的性质可分为河（江）滨、湖滨和海滨。对这类空间的研究非常丰富，其中，滨水工业空间的改造复兴是当下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滨水工业空间常包含港口码头、物资仓储及生产加工等多个类型区域，是伴随着工业化浪潮和大规模的航运交通出现并发展的建筑空间，这类空间曾是城市中最富活力的地区，记载和见证了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篇章。^④现有研究认为，滨水工业空间的衰落与凋零一般是由城市产业结构转型调整及内港外迁造成的。^⑤随着全球城市的转型发展，世界上许多城市的传统工业区都在被规划着重新走向复兴。国外多个传统工业城市都制定了相应的空间复兴政策，如英国的伦敦和卡迪夫、德国的杜塞尔多夫和萨尔布吕肯、澳大利亚的荷伯特和悉尼、日本横滨以及美国的多个城市皆针对不同工业遗产形态进行改建，纽约还为此开辟了“都市制造业驱动下的城市滨水区复兴模式”。^⑥

相较于国外，我国的滨水工业空间改造建设虽起步时间较晚，但现有研究表明，其改造的方向与目标是较为清晰的，即主要是为了承担引领城市经济快速发展、推动产业升级转型以及承载周边居民交往活动等公共性作用。^⑦国内不同流域都有相应的滨水工业空间更新改建方案，如长江流域的上海杨浦滨江工业带、京杭大运河杭州段的滨水工业带以及珠江流域的广州滨水工业带等。建筑学、城市规划等学科对此类空间更新的研究已相对详备，包括京杭运河杭州段建筑群的景观空间分析、^⑧黄浦江西岸的复兴机制、^⑨广州珠江流域的工业遗产廊道开发^⑩等不同区位不同类型的滨水工业空间更新改造问题。然而，相关研究多聚焦于空间的物质形态重构、功能转换与经济效益。工业遗产空间虽不具备古历史遗址价值，但若是仅以“形式”或“功能”为核心问题展开研究，可能会忽略空间不仅是物理容器，更是意义生产的场域和社会关系的媒介^⑪这一关键问题。

滨水工业空间的改造，也远不止于物理形态的更新，其本质是一场关于地方记忆与文化认同的重构。

换言之，滨水工业空间从“生产机器”到“消费景观”的转变，并非仅是功能或形式更替的结果，还是充满话语争夺、记忆协商、认同冲突的传播实践过程，需要将滨水工业空间视作动态交互的地方，理解其更新改造如何牵动原工人、在地居民的情感记忆与地方认同。

（二）地方研究“流动”转向下的工业空间更新

“地方”研究为理解工业空间改造提供了核心框架。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明确指出，当“空间”被赋予经验、情感与意义，便转化为了“地方”。^⑫这种地方观指明了栖居者的情感实践和社会活动在空间中的重要作用。雷尔夫在《地方与无地方》的研究中则认为，城市化演进所造成的千城一面现象导致了地方消逝的必然。^⑬可以看出，传统的人文地理学家基于在地经验的分析，所秉持的地方观往往是静态的，强调稳定性与地方认同的固定性。但是，随着全球化以及新媒体的发展，地理学者也逐渐认识到传统地方观念所遭受的冲击，地方研究的动态性取向显现。如多琳·马西认为地方与外界的联系、地方的意义以及地方建构的过程本身都是在不断变动着的。^⑭在戴维·莫利传播与流动的视角下，电视这种电子媒介已然带来了一种再地方化的新机制。^⑮甚至雷尔夫本人在2021年也断言数字媒介必然会带来一种地方上的“失序”（Disorientation），^⑯体现了他由稳定地方观到非固定性地方观的思路转变。总体来看，当新媒体被人文地理学家纳入专业视野，其研究也都逐渐将地方指向为开放的、由外部关系编织的、动态的过程。

在工业遗产改造研究中，学者们关注城市工业空间或工业遗产再利用中的地方性问题，指出城市工业遗产再利用应通过强调地方性来强化地方认同。^⑰也有学者提出，应该通过深入阅读场地、尊重场地记忆、深挖工业文化以及历史文化、重视地方性等改造策略来维持工业遗产空间的地方特性。^⑱这揭示出地方更新的核心矛盾在于，如何在物理更新中保留或重构那些赋予空间以“地方”特质的关键节点，为理解公众对改造项目的认知与情感反应奠定理论基础。实际上，地方性的流失趋势不可阻挡。^⑲虽有研究从不同的主体出发，^⑳关注工业空间改造过程中如艺术家、^㉑地方机构^㉒和曾经生活其中的工人阶级^㉓受到的影响和采取的行动，但这些研究的出发点常常围绕空间本身，空间中生存的主体多被看作是被动影响者，常缺乏二者互动的视角。

回到维系人地关系的具体维度上来看，地方意象、地方依赖、地方认同、地方记忆等是研究者们常关注的要素。其中，地方记忆与空间更新改造问题的关系较为密切。这是由于，记忆是连接地方与情感认同的关键机制。有研究指出，城市记忆是一种动态复杂系统，其包括客观环境存在物与人的主观意识在时空中的互动作用，与城市形态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㉔而实际上，人类对记忆的研究由来已久，从古典哲学家奥古斯丁、休谟到洛克都指出了记忆对人类的重要性，为现代记忆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哲学基础。^㉕而后来的哈布瓦赫、诺拉和阿斯曼夫妇则对记忆开展了更加深入的分析。哈布瓦赫强调了记忆的社会性，认为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㉖城市记忆的概念正源于哈布瓦赫提出的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的概念。^㉗在此基础上，研究进一步指出了城市记忆作为城市历史社会时空图式，受到社会、文化习惯等因素的潜在控制与影响。^㉘当前，也有研究已关注到工业景观作为工业文化记忆载体的价值，并试图在城市规划中通过保留“物象”与“场所”来维系记忆。^㉙不过，相关研究多聚焦实体空间与社群互动，未能充分回应数字时代记忆生产的媒介化现实。正如希尔在研究中提到的，记忆诞生于奇诡的联想，那些无法解释的时空关联，会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爆发，因此她指出记忆需要新的书写方式。^㉚近年来，传播学者将目光投向了“媒介记忆”研究，关注影像、短视频等如何参与城市记忆的书写。^㉛这提示我们一种重构滨水工业空间的地方记忆叙事或是重新锚定人们地方认同的路径。需要关注的是，滨水工业空间的记忆叙事，已不再局限于上述研究提到的通过物象或实物陈列来进行维系，还需要跨越建筑学、城市规划学等学科边界，关注其在数字影像、社交媒体等新记忆书写载体中被如何传播、解读乃至重塑。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为理解滨水工业空间改造提供了地方理论与记忆研究的重要基础。然而，在数

字时代，滨水工业空间更新过程是如何利用特定的物质记忆的？数字媒介如何深度介入记忆重构与认同形成的动态过程？又借此塑造了具有何种特征的新地方认同？这些问题仍需进一步探讨。本文在我国社会与历史语境下的滨水工业空间改造实例中，聚焦滨水工业空间改造中地方记忆如何被选择和媒介化重构，在开放而动态的地方观下关注“流动的地方”中的人地关系。

三、研究方法

研究需要关注滨水工业空间更新中地方感重建的内在机制和逻辑，因此，主要结合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两种质性研究方法展开。研究者首先通过参与式观察摆脱原有思维定势，拓展理解滨水工业空间的新视野，再通过深度访谈获取对已知事物的其他解释。参与式观察涉及的地区分为珠江流域和长江流域，主要以广州市内珠江沿线和杭州滨水工业空间为中心展开。

在访谈方面，本研究主要采取目的抽样（Purposive sampling）和滚雪球抽样（Snowball sampling）两种方式选择访谈对象，最终对滨水工业区的退休工人、社区工作人员、参与更新规划设计的艺术家等 18 名符合条件的访谈对象展开深度访谈（如表 1）。受访者主要集中于广州、杭州、北京、成都等具有滨水工业空间的城市，均对该类型空间的原始功能与社会生态拥有具身体验与历时记忆。访谈形式包括线上和线下访谈，访谈时长在 35—105 分钟之间，部分受访者接受了多轮访谈，访谈持续至信息趋于饱和为止。为保证调研与访谈资料的有效性，研究者还搜集整理相关公开资料（如政府文件、规划文本、报刊资料及社交媒体平台中的文字、图片与视频等），并与一手调研资料进行三角互证和交叉检验，以丰富数据层次、弥补访谈局限。

表 1 访谈对象信息一览表

受访者编码	年龄	性别	职业	访谈形式	所在地	访谈时长
S1	45	男	文化机构人员	线下访谈	广州	55min
S2	55	女	自主经营者	线下访谈	广州	35min
S3	52	女	自主经营者	线下访谈	广州	35min
S4	53	男	自主经营者	线下访谈	广州	40min
S5	35	女	社区基层人员	线下访谈	广州	35min
S6	80	女	退休职工	线下访谈	广州	55min
S7	22	女	学生	线上访谈	广州	40min
S8	35	女	法律实务从业者	线上访谈	杭州	55min
S9	25	女	学生	线上访谈	杭州	45min
S10	25	女	学生	线上访谈	杭州	60min
S11	24	女	学生	线上访谈	成都	55min
S12	23	女	学生	线上访谈	攀枝花	55min
S13	33	男	建筑师	线下访谈	深圳	105min
S14	65	女	退休职工	线上访谈	北京	55min
S15	29	女	设计师	线上访谈	北京	45min
S16	43	男	艺术馆馆员	线下访谈	广州	55min
S17	42	女	讲解员	线下访谈	广州	35min
S18	28	女	艺术家	线上访谈	北京	45min

四、地方意义的流动：滨水工业空间更新模式分析

普瑞德认为地方不只是人类活动的布景，他强调在“流变（becoming）”中发现人们利用和创造物理环境时不断发生的地方意义的嬗变。^②“成为何种类型的地方”常常是空间更新改造面临的首要问题。总体来看，滨水工业空间的更新改造模式大致分为潮流商业消费模式、产业集群办公模式、公园模式和文博模式四大类（如表2）。

表2 滨水工业空间改造案例表

序号	改造模式	代表建筑	改造后的用途	其他同类型改造案例
1	潮流商业消费模式	广州太古仓码头、杭州轻纺化工等工业厂房聚集区	文化创意、展览展示、观光旅游	西泠冰箱厂一处老厂——杭州创意设计中心 大干围码头仓库群——B.i.g. 海珠湾艺术园区 珠江啤酒厂——珠江琶醍啤酒文化创意艺术区
2	产业集群办公模式	增城糖纸厂、国营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	文化创意产业园	广州啤酒厂——广州TIT创意园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广州制造厂——扬涛科技广场 杭州蓝孔雀化纤厂——LOFT49（杭实创意中心） 双流水泥厂——杭州之江文化创意园
3	公园模式	广州钢铁厂遗址、中石化小河油库	休闲公园、公共娱乐	杭州钢铁厂遗存——大运河杭钢公园 浙江省之江水泥厂——杭州之江船工业遗址公园 广州造纸厂——广纸文化公园（规划中） 广州造船厂——滨江遗址公园（规划中）
4	文博模式	五仙门发电厂、杭州市中石化炼油厂工业遗存	博物馆、艺术科技中心	广东士敏土厂——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 协同和机器厂——协同和动力机博物馆 八丈井工业园——A8艺术公社

在潮流商业消费模式下，滨水工业空间更新的核心在于将工业遗存转化为消费体验场景，使地方记忆以商品化的形式重新流通。在对广州太古仓码头、珠江琶醍、杭州创意设计中心等调研中发现，这些原本承担货物装卸、仓储等功能的空间被改造为餐厅、酒吧、文创市集等消费空间，同时还保留了一些具有视觉冲击力、易于符号化传播的工业元素。但是，这些元素常常脱离原有的功能系统，而是在景观美学的引领下被重新编码为供社交媒体“打卡式”传播的新符号。这类地方的使用者也多为游客，其与地方的连接并不依赖于长期居住或劳动生产，而是得益于消费、拍照和社交媒体分享的瞬间共鸣。

产业集群办公模式则不完全剥离工业空间的生产属性，而是置换为创意生产、知识生产等，使地方意义在生产范畴上得以延续。原有的大跨度厂房、高挑空车间被改造为设计工作室、科技公司办公室、艺术创作空间。地方的记忆不是被封装为供凝视的过去，而是被整合进正在进行的创造性实践空间中。在这里，地方认同并非指向情感性依恋，而是基于职业身份形成的。

以广州钢铁厂遗址、大运河杭钢公园、之江船工业遗址公园为代表的公园模式，呈现出与消费模式截然不同的意义流变方向。这种更新模式的逻辑在于，将封闭的工业生产区转化为开放的市民共享空间，高炉、车间、运输轨道被整合为公园景观。在更新之后，空间的使用权从特定生产者手中转移到公众手中，地方被转变为共享的资源。周边居民是主要的空间使用者，他们与地方的联结不依赖于消费行为或社交媒体发布，而依赖于重复性的身体实践，催生的是日常性、邻近性、低强度却高黏性的地方依恋。

文博模式是一种传统的工业遗存空间更新模式，旨在以清晰的时间线和明确的遗产知识框架，将生产空间转化为陈列空间，将生产设备转化为可观看的展品，从而使地方记忆档案化和文本化。在这种更新模式下，讲解员的解说、展品的说明牌、场馆的宣传册共同构成一套规范化的地方话语，并影响着参观者的地方认识。不过，个人化的工人记忆往往难以进入文博模式的叙事中，地方意义在流变中出现不

可避免的缺失。

综观4种更新模式，可以看到，潮流模式将地方记忆导向审美消费，产业集群模式将地方记忆导向创意生产，公园模式将地方记忆导向市民日常生活的共享与共建，文博模式则将地方记忆导向知识传承。4种模式展现了工业遗存的地方意义向何处流变的宏观途径，而在微观层面上，物质锚点的选择、社会关系的重组以及数字媒介的介入等如何影响地方感的流动还需进一步展开。

五、再造新地方：记忆的符码化重组与新感觉结构

对于某些人而言，无地方感已成为现代生存状态的核心特征，但事实上地方在许多人的生活中依然至关重要，甚至可能是大多数人的生活核心。^③以滨水工业空间为代表的地方虽曾承载了一代人的记忆与情感，但城市去工业化发展与空间形式的流变，使其成为都市消费主义的新载体。基于滨水工业空间更新过程可以看到，在物质遗存的策略性调用、社会关系的创造性重组、数字媒介的深度介入中，各参与主体持续进行着地方意义的协商、转译与再造实践，在维系原有人地关系的同时促成新的地方认同感。

（一）物质内涵的流变：从生产要素到地方记忆的符码化

在城市更新时，规划者面对的不仅是一块待再开发的土地，更是一个承载着栖居者集体记忆与生命历程的地方。这意味着，政策规划并非只是冰冷的技术蓝图或指令，而是要理解空间原有的情感依附，正视不同群体在其中可能出现的诉求冲突。2022年，广州市政府印发的《广州珠江沿岸地区高质量发展带工信产业导则》明确广州滨江带更新，需要遵循数字经济引领、产业链群联动、集约集聚发展、创新要素协同、绿色低碳提升的基本原则，着力构建珠江沿岸地区协同高效、市场活跃、要素齐备、量质齐升的现代产业体系。^④其核心就在于，发现并主动维系空间中的关键元素，并需要在物质形态延续的基础上，将其转化为适应现代生活的功能性公共空间，实现原功能的转换。

为此，在更新过程中，规划者与设计师会有意识地保留和转化一系列工业时代的记忆“碎片”，如历史铭牌、红砖墙体以及裸露的锈迹等，以此作为原工业空间的记忆载体。工业机器上那些大生产时代的重要部件早就随着生产的终止而失去生命，巨大的齿轮、生锈的管道、蒙尘的仓库和沉默的高炉都在现代都市中沉寂。但是，通过策略性地留存高炉、红砖墙等物质痕迹，并为之注入符合当下需求的使用语境后，这些原本属于大生产时代的工业文化符号被转译成可触摸可解读的对象。如，工业机器被改建为公共雕塑，炼钢高炉成了网红“打卡”新地标，仓库被改建为能直观体会时代感的影院，码头也成为人们亲近水域的延伸平台……这些潮流消费模式与公园模式下的工业遗产更新，使原本属于工业化的“记忆碎片”脱离静止的过去，成为可被当下不断调用、诠释与消费的活跃资源。年轻人所热衷的文化活动不断为工业元素注入当代诠释，属于工厂的记忆在流动中被持续重组。在这个过程中，记忆不再是静态的，而是一种在现实生活中不断被调用、被讨论和重新编织的资源。“杭钢公园会在比如说高炉旁边办音乐节，在旧的厂房里面进行一些艺术的展览，在原来那个厂房的旁边就是中央的广场上支了很多的摊子，进行产品的售卖，不仅让我感受到了工业历史的痕迹，也能让我出于对这些新空间的兴趣愿意去那边打卡。”（S10）

“地方的物质性，意味着记忆并非听任心理过程的反复无常，而是铭记于地景之中的。”^⑤可以说，更新需要将原本服务于生产的部分，转化为服务于体验的审美感知，这些物质符号的存续作为时间与劳动的见证，在更新改造下被用作直接唤起栖居者的工业历史想象的物质资源。换言之，在更新改造后，依然保留的旧痕迹并非是怀旧的装饰，而是扮演着维系与再织人地关系网络的关键物质锚点。其目的即是通过激发环境中人的身体感知与历史想象，为剧烈变迁中的地方提供具有连续性的线索。保罗·罗达韦认为，体验的环境等因素会直接唤起人们对地方积极或消极的强烈感情。^⑥在滨水工业空间更新中，

那些被刻意保留的红砖、锈迹与工业肌理，正构成人们感知工业文明沉积的感官环境。“它不像其他城市建筑那样光滑或者现代，就是有比较赤裸裸的那种感觉，给我的感觉是很‘硬核’的，很有那种工业风。”（S11）

地方不仅仅意味着建筑物，^⑧它需要超越单纯的经济利益和商业逻辑，将历史正义、社会公平和文化存续纳入核心考量，将规划过程转化为一个协商、聆听与寻求共识的公共过程，从而确保空间的变革不会演变为对历史脉络的粗暴剥离或对弱势群体的压迫。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地方的“记忆碎片”成为更新中被保留和放大的地方符码，人们正是透过这些标识性的符码来回望当下的空间从何而来，在记忆的碎片中寻找人地关系的源头。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物质存续本身并不能自动地维系人地关系，附着于这些工业符号的记忆还需要经由社会互动来激活。这启发我们在滨水工业空间的更新中，不仅要关注功能与形态的转换，还需要关注引发其作为动态关系集合的人地关系的重构。

（二）人地关系的重组：滨水工业空间的新感觉结构

多琳·马西认为，地方是由特定“社会关系星群”在交汇中编织而成的。^⑨因此，人地关系再生产的核心就在于社会关系网络的延续与转化。成功的更新并非以全新的关系网络彻底取代旧的空间脉络，而是以保留部分物质记忆为锚点，以重新设计的公共空间为交汇平台，促使新旧社会关系在此相遇、协商与融合，并进一步编织出新的“关系星群”。正如受访者提到自己初次造访更新后的滨水工业空间时说，“它就在运河沿岸，你沿着运河走着走着就到了，还挺惊喜的。”（S9）这即是新旧空间平滑接续的体现，揭示出一种自发而非强制的、日常化的新人地关系开始生成。滨水工业空间更新在改变原有的空间利用方式的同时，也通过拓展公共活动平台，为当地居民编织了新的生活网络与新的地方依附关系。“因为以前可能附近没有这种散步的地方，（以前）环境比较一般。那现在又有商家，又有吃饭的地方，而且这些都在临江的位置，整体环境肯定是改善多了，附近居民都有了晚上可以散步的地方。”（S3）

尤其是以公园模式为导向的更新（如广州钢铁厂遗址、大运河杭钢公园等），通过将原本破败的旧滨水工业空间扩展为便于居民散步、交流的公共场所，不仅改善了栖居环境，更创造了促进日常交往与社会联结的新地方。这些平台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因空间功能剧变而可能引发的人与人、人与地方之间的情感区隔和关系断裂。正如凯西所指出的，在生命与现实的形成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并非空间的绝对性，而是我们对特定地方的必然融入。^⑩因此，滨水工业空间更新不仅在于保存物质的工业“记忆碎片”，更在于创造能承载并激发社会互动的“地方性”场所，使记忆得以在人与人的交往中流动和延续，维系动态发展的人地关系网络。

不过，这种人地关系网络的再生产，还需落脚于更深层的情感与意义转化，即栖居者特定感觉结构的内化。雷蒙德·威廉斯曾提出“感觉结构”概念，用以说明一个时代中人们“无需表达的共同经验”与共享的生活感知，是特定时代与地点中人们对于生活的总体感受，是在特定时期内形成的并影响人们的情感体验和表达。^⑪滨水工业空间所代表的集体化、社区化的感觉结构，就是工业化时期一代人共同经验的凝结。“当时进厂是很抢手的工作，我大姐大学毕业后可以当教师都不愿意去，就想去厂子里。不仅仅是因为当时赚得多，实际上，那时候我们厂就像一个小社会，食堂、医院、幼儿园都有，我们那时候很少去市区。过年过节还会办篮球赛啊排球赛啊这些，大家一起很热闹的。”（S14）可以看出，作为上世纪工业时代的重要遗存，滨水工业空间承载了许多人关于工业大生产时期的重要记忆。但是，更新并非是为了复现此结构，而是考虑如何让其以新的形式在当代重新被认可。实际上，人对地方的依恋本质上就是对嵌入该地的社会关系的依附，是人们基于与地方有关的情感和情绪、知识和信念以及行为和行动的相互作用形成的情感。^⑫在此过程中，记忆的“碎片化”存在与流动性重组成为感觉结构被重建的关键机制。也就是说，滨水工业空间更新无法通过还原一个完整的过去来复现老工人记忆中的集体化生活，却通过策略性地留存碎片化的物质痕迹，并以此创造新的叙事语境促进新感觉结构的出现。“这个更新换代很快，

国家的建设突飞猛进，一些小的个人的情感肯定是有的，但是个人肯定服从集体，私人的情感肯定要服从大的政策安排。而且，现在的生活环境的确改善挺多的。”（S6）

新的感觉结构相对应的是新的情感共鸣模式，更新后的滨水工业空间不再以巨型机器对人们产生感知体验上的压迫，而是邀请人们以全新的身份加入地方的互动。在这一过程中，虽然也保留了某些原始的空间特质，但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让人们产生闲适的感受，激发人们的生活兴趣，鼓励人们对新空间进行新的探索等。这种新感觉结构并非是对工业时代感觉结构的断裂式抛弃，而是将集体生产、共同生活等核心价值要素，转译为一种适合当代都市生活的情感语法，也就是对工业痕迹的欣赏、对公共生活的参与以及对地方独特性的认可。

毋庸置疑的是，在时代的发展浪潮中，记忆是必须被重新建构的。这种重构并非为了复刻一个想象中的历史的黄金时代，滨水工业空间更新的最高目标也从来都不是打造一个完美的怀旧产品，而是为了理解时代变迁的脉络，培育一个能够持续支持在地的社会关系良性生产、促进多元意义碰撞交融并保持向未来开放的地方。

（三）地方记忆的流动装置：数字叙述重塑滨水工业空间记忆之场

滨水工业空间的更新，不仅发生在物质层面，也同时在数字维度展开。灯光艺术、AR导览、VR体验与社交媒体的大众化叙事等，共同将工业遗存转译为了一个虚实交织的数字“记忆之场”。皮埃尔·诺拉用“记忆之场”的概念来指那些在物质或精神层面承载重大意义的统一体，兼具实在性、象征性与功能性。^{④2}简言之，诺拉所言的“记忆之场”就是承载着人们的记忆、认同与身份象征的空间。滨水工业空间正是这一处境的现实写照，可以看到，停转的机器、空置的厂房等那些过去与生产劳动紧密相连的、鲜活的集体经验和身体记忆正在随着那一代人的老去而加速消逝。所幸，这一场域所承载的记忆、认同与身份象征却在更新中借助数字化技术得以重新讲述。

有媒介记忆研究学者断言，当下人类一切记忆的最终归宿就是“数字化记忆”，^{④3}这也正是我们需要借由数字媒介来重新激活滨水工业空间作为记忆之场的原因。在滨水工业空间转型的进程中，数字媒介已经深度介入，重塑着记忆的形态和传承方式。在灯光艺术、AR、VR等数字技术的加持下，传统的文博展览模式下的滨水工业空间更新已走向较为成熟的虚实交织模式。“这还是比较有未来感的，在灯光下建筑也显得有比较强的机械感，所以在当中就让我产生了类似‘赛博朋克’的感觉。”（S9）

诺拉认为，记忆和历史之间的巨大鸿沟中有两种记忆，“一种是‘整体性、支配性的’，这种记忆缺乏自我意识，是一种没有过去的历史，永远陪伴着遗产；而另一种则是我们的记忆，是经过挑拣后的痕迹。”^{④4}这一虚实交织的叙事方式深度激活了后一种记忆，激活了地方记忆的意义与功能。这主要表现在，公众通过上传照片、分享故事、参与线上的展览共创，成为数字媒介上的记忆贡献者。媒介记忆与历史记忆不同，后者往往是一个线性系统，而媒介记忆则通常是个性化和碎片化的。^{④5}媒介记忆所提供的是一种庞大而精密的记忆与认同建构可能，多元叙事在互联网空间中共存共见，构成一种在流动中被持续生产、协商与重构的地方性新形态。“之前熟悉的厂区成为公园，小红书经常给我推送，现在已经成为杭州的一个游玩点，整个推文里面的照片也是非常有吸引力的。”（S10）

彼得斯指出，媒介作为对文明秩序有着重要影响的器具，它能够容纳的是一种能锚定人的生存状态的可能性。^{④6}随着老一代工人的老去，滨水空间中原先依附于集体劳动的身体记忆与鲜活经验正加速消逝。数字媒介为此提供了关键的转换与存续机制。在数字场域中，无数个体、碎片化的记忆痕迹得以汇聚、碰撞与对话，最终与官方结构化的历史叙事形成互补，共同编织出更为多元丰富的地方叙事，催生出地方的数字化记忆。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数字技术对实体空间的改造，还是社交媒体中碎片化的公众书写，都并非着意于复现已逝的实景，而是建构一种可供感知、对话与传承的实践。如在小红书等社交媒体平台上，有

来自各地的用户上传到访照片、分享打卡故事、共同讨论工业空间的身份转变，共同讲述在工业空间中的文化馆、音乐节、市集中的经历，从被动的历史记忆接收者转变为积极的地方记忆贡献者，展开一种可供感知、对话与传承的记忆实践。“手机上一些工厂的照片和视频我看过，和我们那时候的不一样，但是现在年轻人做的东西也很好玩，我有这种接受的开放的心态，都是为了让这个地方更好是吧？”（S14）

数字技术环境为用户带来了互动式的媒介生活，并由此改写着地方意义。^{④7}滨水工业空间在物理功能转换之后，依然能作为一个情感与意义的强大磁场，持续吸引人们的投入和参与。数字与现实的交融重塑了滨水工业空间的记忆之场，确保工业时代的记忆能以新媒体的语法形式被公众所感知、记忆与继承。同时，城市更新也使滨水工业空间不再仅仅是本地居民回溯往昔的记忆之场，它还是吸引不同人群在此共创未来的希望之场。在这里，人与地的联结，不再是先验的、凝固的，而是在每一次跨域交往、每一次对共享空间的体验中，被持续地、生动地再生产出来。这种人地关系，因其动态和开放，反而获得了抵御时间冲刷的韧性，使得地方在永恒的流变中，始终保持着一种如多琳·马西所期待的流动的进步的地方感。

六、“流动中栖居”：作为一种新地方认同方式

水的流行灵变正是万物流变的映照，^{④8}它拒绝永恒的形状，顺应容器的边界与环境的力量而改变。我国《关于全面推进江河保护治理的意见》明确指出，要深入挖掘水文化内涵与时代价值，实施水文化传承创新工程。依托自然河湖和水利工程，因地制宜开发水文化资源，提升水文化博物馆功能，培育水文化品牌。^{④9}这对滨水工业空间的更新改造具有重要意义。改造后的滨水工业空间作为城市变迁的容器，作为工业时代的物质存续，为流动中的关系、地方记忆和地方认同提供了依附界面。本研究基于对滨水工业空间更新现象的考察，力图分析这一“流动的地方”如何在更新与改造过程中尽可能地转译原有的地方记忆，并通过记忆的重建来促进地方认同进而维持人地关系的。我们认为，空间更新促使新旧社会关系在此相遇、协商与融合，并编织出新的关系星群，关系网络重构与记忆碎片活化并非是对工业时代感觉结构的断裂式抛弃，而是将其转译为适合当代都市生活的空间内涵。同时，数字技术作为地方记忆与地方认同间的调适工具，在更新主导者所设定的空间新符码之外，还促进栖居者以可参与、可编辑的形式，来实现生存需求与怀旧追忆间的动态平衡，促使其在多元话语交汇中形成开放的新地方认同。

传统的地方认同通常指的是一种稳定、一致和没有矛盾的感受，是与固定地域绑定的情感，源自于长期的居住经验，植根于本地的社会结构、政治生态和独特文化。^{⑤0}数字媒介重新配置了新的空间关系，让城市成为“人-媒介-空间”交互的场景。在滨水工业空间的黄金时代，这种认同与制造业的命运紧密相连，工人的身份、社区生活的纽带和工业化大生产的节奏等共同编织了一张紧密的地方意义之场。其作为社会制度的产物，是由客观关系构成的一种动态系统。这意味着，地方的意义并非由其内部固有的本质属性决定，而是在与外部他者的差异和关联中被不断强化的。本研究进一步表明，新的地方认同并非是向旧模式的回归，而是在数字媒介与跨域交往的驱动下，于动态关系中生成的一种“关系性”与“过程性”认同。它不再固守于封闭的地域本质，而是通过主动将地方重新嵌入更广阔的关系网络，在持续的内外对话中重拾地方认同。

首先，新的地方认同是一种外向型的认同。地方的价值在于其能否融入并支撑个体当下的生活网络与情感实践。在滨水工业空间持续的动态更新过程中，它拒绝将地方视为一个已经完成的、静止的和仅供怀旧的客体，而是通常将其视为“持续变动的社会关系地理学的产物”。^{⑤1}更新后的空间作为开放的公园、文化场馆与创意园区，成为各种新的社会关系再嵌入的容器。这种在新关系网络中生成的地方认同，不执着于追寻地方的根源，而是坦然接受地方身份的混杂性，并积极通过建立与更广阔世界的连接来确认

自身的独特性。

其次，新地方认同是在多元主体跨域交往中实现的。当数字媒介深度介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交往已经从现实的空间场景逐渐拓展到虚拟媒介上。数字媒介创造了一个平行于现实生活的“媒介地方”，使得关于滨水工业空间的叙事、记忆和讨论超越了物理边界。在这种叙事交融的复合场景中，多元主体在其中相遇、对话、碰撞甚至冲突，其间的地方认同不再是基于单一、封闭的地方经验，而是一种在多元话语交汇中的协商，是一种混杂的新认同。正如多琳·马西指出的，一种地方感及其地方特性只能建立在将这个地方同更远的地方联系起来的基础上。^⑤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在的大部分工业空间更新都已经在邂逅“媒介地方”，因为甚至它们的原住民通常都是受到社交媒体中的影像邀请而来。有受访者提到，我经常回来，是因为我需要有一个地方去消磨时间，我需要有一个地方带我的家人去走走看看。手机上看到这个原来熟悉的地方现在变得越来越有趣了，刚好就成为了我们所需要的地方。(S12)无论是基于社交媒体的感召，还是自觉需要这样的地方，代表的都是一种实用而开放的地方认同，本质上是源于地方被重新放入更加广阔的关系网络，这也就体现了这种新地方认同的开放性和动态性。

最后，还需进一步明确，新地方认同通常在动态关系网络中实现。现代人的社会关系、社会活动已经从有限的地方性场景中脱离出来，并实现了跨时空距离的重组和融合。^⑥也就是说，现代化过程中的交往已经逐渐脱离地域的范畴而被延伸和扩展。然而，现代化的进程不止于“脱域”，更在于实现“再嵌入”。本身工业空间其实是一个跟人有距离感的地方，一般人不会去那。然后，它现在其实是在保留原先的外观上的建筑体制的前提下，让大家更有想要进去的欲望，就是需要有一个拉近跟公众的距离感的改造过程。(S9)正如受访者所言，工业空间改造正是在“拉近与公众的距离感”时获得认可。在此，对地方的认同源于对共享平台的使用和参与，而非先验的血缘或地缘，所建立的动态流动的关系网络，虽然不同于昔日工厂社区的强连接属性，却以其多样性与开放性重新锚定着人地互动的节点。

七、结 语

齐格蒙特·鲍曼认为，流动的特征可以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隐喻，并明确指出“流动的现代性的到来已经改变了人类的状况，否定或贬低这种变化都是草率的”。^⑦面对流动性的挑战，试图通过物质存续或形态冻结来固化过去的怀旧策略，或许注定是徒劳且失真的。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放弃重建地方，而是要求我们以更复杂、更富韧性的方式去守护地方记忆，以及在变动不居中重建个体的地方认同感。诚然，更新是为了人们能够在地方中更为便利地栖居。然而，在这一总体目标导向下，更新的方式、形态等都有可能影响栖居者的情感生态与人地关系。在我们的调研中，常常听到如下有趣的转折：“生活肯定更方便了”，“现在我们也有这么好的地方去散步了……给年轻人开了很多花花绿绿的消费的地方”。可以看出，在个人生活与环境生态都整体向好发展的情况下，同质化、士绅化等新城市主义造成的问题似乎可以被忽略，但又常被栖居者有意无意提及，以映射地方依恋在空间缝合处的断裂。

这也提示我们，真正稳固的关系不再源于物质的永恒，而源于在流动中持续建构有温度、能对话的能力。这或许是我们这个时代关于如何与变迁共存、如何在流动中栖居的一个答案。难以回避的是，地方的流动始终是一个持续开放的进程，对地方的研究亦是如此。本研究主要是基于特定案例的质性考察，虽力图深入，但难免囿于样本的覆盖范围与时空截面，仍有如工业遗产空间影像记录的历时性比较、外来打卡者如何通过数字影像形塑工业遗产空间的新公共记忆等诸多关键问题，待后续研究在更广阔的社会语境与更长时段的考察中不断深化与修正。📖

(责任编辑：颜云霞)

参考文献：

- ①工业和信息化部.《产业发展与转移指导目录(2018年本)》解读[EB/OL]. [2025-12-08]. https://www.miit.gov.cn/zwgk/zcjd/art/2020/art_4abfcf57ee9f4b8ab10ffbad2245d5ef.html.
- ②陈亚, 阎景娟, 李宇. 城市后工业景观与空间记忆: 以金牛山生态修复为例[J]. 城市发展研究, 2024(2): 30-34.
- ③段义孚. 空间与地方: 经验的视角[M]. 王志标,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126.
- ④姚朋. 纽约滨水工业地带更新中的开放空间实践与启示——以哈德逊河公园为例[J]. 中国园林, 2014(2): 95-99.
- ⑤张磊. 滨水工业遗存的艺术化更新策略——以上海“一江一河”为例[J]. 上海文化, 2024(4): 102-110.
- ⑥李珊珊, 钟晓华. 新都市制造业驱动下的城市更新实践——以纽约滨水工业地区为例[J]. 国际城市规划, 2023(6): 95-102.
- ⑦刘若昕, 王林, 任宁, 等. 生活型滨水公共空间品质评价研究——以上海苏州河为例[J]. 上海城市规划, 2023(3): 84-90.
- ⑧朱晓青, 翁建涛, 邬轶群, 等. 城市滨水工业遗产建筑群的景观空间解析与重构——以京杭运河杭州段为例[J]. 浙江大学学报(理学版), 2015(3): 371-377.
- ⑨丁凡, 伍江. 全球化背景下后工业城市水岸复兴机制研究——以上海黄浦江西岸为例[J]. 现代城市研究, 2018(1): 25-34.
- ⑩郭浩, 马源. 工业遗产廊道模式下的江河沿岸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以广州珠江为例[J]. 工业建筑, 2022(5): 9-15.
- ⑪亨利·列斐伏尔. 空间的生产[M]. 刘怀玉, 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1: 249-251.
- ⑫ Tuan, Y. F.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1: 19-33.
- ⑬ Relph, E.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M]. London: Pion, 1976: 79.
- ⑭多琳·马西. 保卫空间[M]. 王爱松, 译.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13: 11.
- ⑮戴维·莫利. 传媒、现代性和科技: “新”的地理学[M]. 郭大为, 等译.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0: 196.
- ⑯ Relph E. Digital Disorientation and Place [J]. Memory Studies, 2021, 14(3): 572-577.
- ⑰李珊珊, 钟晓华. 新都市制造业驱动下的城市更新实践——以纽约滨水工业地区为例[J]. 国际城市规划, 2023(6): 95-102; 丁新军. “地方性”与城市工业遗产旅游再利用——以美国马萨诸塞州洛厄尔国家历史公园为例[J]. 现代城市研究, 2018(7): 68-76; 何健翔. 风景与遗址——泛化城市中的公共性与地方性重建[J]. 建筑学报, 2019(7): 48-53; 邓元媛, 李晗. 九江市近现代工业遗存的地方性特征研究[J]. 工业建筑, 2023(12): 77-84.
- ⑱陈亚, 阎景娟, 李宇. 城市后工业景观与空间记忆: 以金牛山生态修复为例[J]. 城市发展研究, 2024(2): 30-34.
- ⑲王庆卫. 共同性视域下的地方研究: 从地方感到地方性知识[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3): 157-165.
- ⑳ Görmar, F. Weaving a Foundational Narrative Place-Making and Change in an Old-Industrial Town in East Germany [J].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024, 32(11): 2338-2359.
- ㉑ Coenen, K. Creatively Transforming Periphery? Artists' initiatives, Social Innovation, and Responsibility for Place [J]. Norwegian Journal of Geography, 2023, 77(1): 47-61.
- ㉒ Henderson, S. R. Transforming Old Industrial Regions: Constructing Collaboration within the Black Country, England [J]. Geoforum, 2015, 60: 95-106.
- ㉓ High, S. Beyond aesthetics: Visibility and Invisibility in the Aftermath of Deindustrialization [J].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Class History, 2013, 84: 140-153; Preece, J. Belonging in Working-Class Neighbourhoods: Dis-identification, Territorialisation and Biographies of People and Place [J]. Urban Studies, 2020, 57(4): 827-843; McMillan Lequieu, A. Speaking of Infrastructures: Industrial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Decline as Symbol of Changing Place Meanings in the American Rust Belt [J]. City & Community, 2025.
- ㉔⑳朱蓉. 城市记忆与城市形态——从心理学、社会学角度探讨城市历史文化的延续[J]. 南方建筑, 2006(11): 5-9.
- ㉕㉖曾一果, 凡婷婷. 数字时代的媒介记忆: 视听装置系统与新记忆之场[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3, 45(1): 93-101.
- ㉗莫里斯·哈布瓦赫. 论集体记忆[M]. 毕然, 郭金华,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303-313.
- ㉘赵政原. 文化景观与城市记忆: 南京浦口火车站的记忆重构[J]. 史林, 2021(6): 90-101, 220.
- ㉙智明远, 雷兴福, 刘刚. 基于城市记忆的滨水空间更新策略研究——以乌兰浩特市洮儿河滨水空间为例[J]. 设计艺术研究, 2025, 15(4): 69-74.
- ㉚ Hill, L. Archaeologies and Geographies of the Post-industrial Past: Landscape, Memory and the Spectral [J]. Cultural Geographies, 2013, 20(3): 379-396.
- ㉛ Pred A. Place as Historically Contingent Process: Structuration and the Time-Geography of Becoming Places [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84(2): 279-297.
- ㉜㉝ Escobar, A. Culture Sits in Places: Reflections on Globalism and Subaltern Strategies of Localization [J]. Political Geography, 2001, 20(2): 139-174.
- ㉞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印发广州珠江沿岸地区高质量发展带工信产业导则的通知[EB/OL]. (2022-09-02) [2025-11-12]. https://gxj.gz.gov.cn/yw/zchb/zcwj/cyzc/content/post_8547766.html
- ㉟ Tim Cresswell. 地方: 记忆、想象与认同[M]. 王志弘, 译. 台北: 群学出版有限公司, 2006: 138.
- ㊱ Rodaway, P. Sensuous Geographies: Body, Sense, and Place [M]. London: Routledge, 1994: 145.
- ㊲⑳㉑㉒多琳·马西. 空间、地点与性别[M]. 宋慧珍, 译.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172, 198, 173, 223, 200.
- ㊳雷蒙德·威廉斯. 漫长的革命[M]. 倪伟,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2: 57.

- ④① Low, S. M., Altman, I. Place Attachment [M]. New York : Plenum Press, 1992 : 9.
- ④④皮埃尔·诺拉·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 [M]. 黄艳红, 等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 15, 4.
- ④③邵鹏. 记忆 4.0 : 数字记忆与人类记忆的归宿 [J]. 新闻大学, 2016 (5) : 67-72.
- ④⑤邵鹏. 媒介记忆与历史记忆协同互动的新路径 [J]. 新闻大学, 2012 (5) : 12-15.
- ④⑥约翰·杜海姆·彼得斯·奇云：媒介即存有 [M]. 邓建国, 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0 : 5.
- ④⑦凡婷婷. 具身实践、认同循环与依“媒”相聚：作为再造青年地方感实践的 Citywalk [J]. 传媒观察, 2024 (7) : 78-87.
- ④⑧陶火生. 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水文明与水哲学 [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4, 30 (8) : 122-127.
- ④⑨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全面推进江河保护治理的意见 [EB/OL]. [2025-6-26]. https://www.gov.cn/zhengce/202506/content_7029509.htm.
- ⑤③胡颖峰. 吉登斯现代性思想研究 [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 : 73-74.
- ⑤④齐格蒙特·鲍曼. 流动的現代性 [M]. 欧阳景根, 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 33.

"Fluid Place" : The Mechanism of Reconstructing People-Place Relationship in the Renewal of Waterfront Industrial Spaces

Fan Tingting, Shao Wenzhe

Abstract : Waterfront industrial spaces have undergone a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city's "industrial hub" and "industrial rust belt" to a consumption frontier, emerging as a pivotal case for examining the dynamic evolution of people-place relationship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urban stock renewal, this study—grounded in the dimensions of place memory and place identity within the theory of sense of place—employs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and in-depth interviews to investigate issues of memory and identity in the renewal of waterfront industrial space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place identity in these spaces is primarily realized through three interrelated mechanisms : the preservation of material symbols, which anchors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industrial heritage ; the reorganization of social relations, which reconfigures the "structure of feeling" in the post-renewal space ; and the medi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which shapes a new form of place memory integrating the virtual and the real. Collectively, these mechanisms foster the formation of new place identities among inhabitants of waterfront industrial spaces. The study argues that maintaining a sense of place in contemporary urban renewal is a continuous process of negotiation, translation, and re-creation across multiple dimensions, closely intertwined with digital technologies and dynamic interactive networks. By conceptualizing waterfront industrial spaces as "fluid places, " this research advances sense of place studies toward a more dynamic and process-oriented theoretical orientation.

Keywords : urban renewal, urban communication, place memory, place identity